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实用

A Coursebook on
Practical Translation

文体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董晓波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2010年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20110101)的成果

实用文体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A Coursebook on Practical Translation

主 编 董晓波
副主编 蒋 菲 陈 艳
许 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用文体翻译教程：英汉双向 / 董晓波主编. —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
ISBN 978-7-5663-0364-6

I. ①实… II. ①董… III. ①英语 - 翻译 - 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6706 号

© 2012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实用文体翻译教程 (英汉双向) A Coursebook on Practical Translation

董晓波 主编
责任编辑：胡小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山东省沂南县汇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85mm × 260mm 17.25 印张 398 千字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0364-6
印数：0 001 - 3 000 册 定价：32.00 元

序

我国翻译人才紧缺，特别是专业化翻译人才高度紧缺，改变了人们传统认为的懂外语就能搞翻译的观念，也使传统翻译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把外语专业等同于翻译专业，认为凡是学外语的人都会搞翻译，忽视了翻译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实，这两个专业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根本的差异。从教学目标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培养外语交际能力，在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技能中，“译”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手段。翻译专业教学则把翻译能力作为培养目标，从职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在双语交际能力基础上的翻译技能。从教学内容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学习语音、语法、词法、句法等语言基础知识，用单一的语言(即外语)去进行听说和表达，基本上不涉及双语转换机制。翻译专业则主要学习如何借助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翻译职业技能来对原语信息进行分析理解，并用译入语将所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双语转换机制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认知学、信息论、跨文化等多种学科，教学中应适当补充相关的内容。从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说，传统外语专业教学需要一个良好的外语交际环境，以利用各种手段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翻译专业教学所需要的则是双语交际环境，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教学资源，训练学生用一种语言来理解信息，而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相同的信息。更重要是，翻译教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

随着翻译职业化进程的加深，翻译产业的形成，翻译研究学科体制化的建立，今天的翻译研究领域远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的学科。翻译作为一个技术知识服务性质的产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识，将专家信息流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为其它行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

职业化翻译最具活力的需求无疑在商业、法律与技术等实用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翻译和语言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把翻译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对其进行分析、管理，以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质量，缩短翻译时间。这使得翻译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性产业。

为了应对翻译职业化的挑战，帮助学生掌握和提高英语实用文体翻译能力，以满足他们毕业后的工作需要。我们特编写了《实用文体翻译教程(英汉双向)》教材，该书理论与实践兼备，改变了以往教材以词、语、句翻译为探讨对象的做法。作者从全新的视角——文体的角度，以文体为内容，以文体为对象，分别详述了应用文、新闻、广告、科技、商务和法律等大类文体的语言文字特点及其翻译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提高翻译能力大有裨益。

本书编写对象是大学英语专业翻译本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翻译工作者。凡是正在从事翻译或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学习本书后，能对翻译的一些基本规律有所

2 ■ 实用文体翻译教程（英汉双向）

了解，有所遵循，从而获得教益，即提高自己的应用文体实用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

本书由董晓波任主编，许倩、蒋菲、陈艳任副主编。此外，感谢孙茂华、董长生、侯远秀、董晓峰、王欣的支持与帮助，以及张迎、施剑、周斌、关琦、陈琳、张明明等同学在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臻于完美，但是限于水平及一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定不乏偏颇和疏漏，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和同行不吝指正，以臻完善。

董晓波

2011年12月

写于南京紫金山麓东方城

电子邮箱: dongxiaobo@163.com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翻译概论 | 1 |
| 第一节 我国翻译简史 | 1 |
| 第二节 翻译的基本原理 | 8 |
| 第三节 西方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 | 13 |
| 第四节 翻译的方法与技巧 | 17 |
| 第二章 应用文体的翻译 | 25 |
| 第一节 应用文体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 25 |
| 第二节 信函 | 27 |
| 第三节 便条、通知、启事、海报 | 42 |
| 第四节 合同、协议 | 50 |
| 第五节 指南、说明书及手册 | 52 |
| 第六节 演讲稿 | 58 |
| 第三章 广告文体的翻译 | 67 |
| 第一节 广告文体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 68 |
| 第二节 各类题材的广告的翻译 | 73 |
| 第三节 翻译技巧点拨 | 80 |
| 第四章 新闻文体的翻译 | 87 |
| 第一节 新闻文体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 87 |
| 第二节 各类新闻题材的翻译 | 91 |
| 第三节 翻译技巧点拨 | 101 |
| 第五章 科技文体的翻译 | 111 |
| 第一节 科技文体的语言特点 | 112 |
| 第二节 科技文体的翻译策略 | 119 |
| 第三节 科技文体译文分析 | 129 |
| 第六章 时政文体的翻译 | 133 |
| 第一节 时政文体的语言特点与翻译 | 134 |
| 第二节 各类题材的时政文体翻译 | 140 |
| 第三节 翻译技巧点拨 | 154 |

2 ■ 实用文体翻译教程（英汉双向）

| | |
|--------------------------|-----|
| 第七章 旅游文体的翻译 | 159 |
| 第一节 旅游文体的语篇特点..... | 159 |
| 第二节 旅游文体英汉互译的翻译策略..... | 162 |
| 第三节 旅游文体文本译析..... | 170 |
| 第八章 商务文体的翻译 | 179 |
| 第一节 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 | 179 |
| 第二节 常用商务文体的翻译..... | 184 |
| 第三节 常用商务文体文本译析..... | 195 |
| 第九章 法律文体的翻译 | 215 |
| 第一节 法律文体的特点与翻译..... | 215 |
| 第二节 法律文体的翻译标准..... | 225 |
| 第三节 法律文体的常用翻译技巧..... | 226 |
| 第四节 常用法律文体文本译析..... | 230 |
| 参考答案 | 245 |
| 参考文献 | 264 |

第一章

翻译概论

第一节 我国翻译简史

翻译活动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打开中国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地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据史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我国各部族之间就有了语言的交流。不过当时的翻译活动是以沟通言语为主，即口译。我国古代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佛经翻译。但是关于翻译历史的分期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本书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次序，把中国翻译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四、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及翻译的职业化。

第一时期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从东汉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发生、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历时一千多年。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时（公元148年），波斯帝国（今伊朗）的安世高来到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地从事译经活动。他翻译了三十部四十卷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变而不滑，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这一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公元3世纪三国时的支廉、公元4世纪东晋时的道安等。

支廉，祖籍大月氏（月支），通晓六种语言，精通汉文和梵文，所译佛经有三十六部四十八卷，他提出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引出了最早的“文”、“质”之争。

道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苻坚热心提倡佛教，特请来释道安成立了专门的译经机构“译场”，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其提出的翻译文体问题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影响颇大。所谓“五失本”其意思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一是经文的词序对汉人来说颠倒了，翻译时将其改为汉语的语序。二是经文质朴，汉文文采好，翻译时较原文有一定的修饰。三是指经文里同一意义的论述，特别是颂文，

往往反复再三，在汉译时被删简。四是经文中类似汉语乱辞（汉语韵文中最后的总结部分）的“义说”，即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的部分，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去。五是经文中连接上下文的话语在汉译时被删去。而“三不易”的意思是说有三件事决定了佛经翻译是很不容易的，这三件事就是：一是圣人提出说法的时代跟译者所处的时代有古今之别，二是圣人的智慧非凡，圣人的哲言所要传达的对象是浅俗的大众。三是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还需要字斟句酌，而现在这些经文却是由平凡的译者来翻译。道安的“五失本”抓住了涉及翻译的直译与意译、质直与文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三不易”涉及了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是系统的、辩证的、先进的中国传统译论。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他来到长安开始译经，共译《金刚经》、《法华经》等三十九部，三百三十三卷。罗什译著文字优美、畅达，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道理，具有“天然西域之情趣”。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译文妙趣盎然，成为当时佛经翻译的最知名、成就最大者，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梁启超评价他所译经文为“秦梵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并且称赞他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公元499—569年）于公元546年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公元6世纪末隋初时的彦琮（公元557—610年）精通梵文，亦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彦琮一生共译经二十二部，约达万卷。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他每译一经，必制序，述事于经首。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籍的格式，尤其是他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对于佛经翻译理论建设有很大的贡献，这主要集中在他的《辩正论》一文中。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佛经汉译的理论表述和总结，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有名的“八备”之说，即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必须具备八条，如要忠于佛法，立志帮人；要宽和谦虚不武断；要埋头研究道术，自甘寂寞；要博览佛教诸典，加强文学修养等等。从翻译理论系统建构的完整性而言，在公元6世纪末，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彦琮的《辩正论》都是独领风骚的。罗新璋先生在《翻译论集》中选了彦琮的《辩正论》一文并附有一条脚注：“《辩正论》可视为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兴旺，出现了玄奘，我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他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姓陈，名祜，法号“三藏法师”，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因出身贫苦，13岁出家。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历时四年，经十六国到达印度。他留学印度十七年，成为当地最著名的外籍高僧。后返回长安，带回梵文经典六百五十余部，于是便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他在二十年间共主持译出经文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却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玄奘主持

的译场译出的佛经质量很高，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需求真，又需喻俗”，其翻译特点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的翻译观在当时很见功力。他所谓的五种不翻指的是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宣扬佛教的用语。同时玄奘还完善了译场，翻译的职司多至 11 种：译主（为全场主脑）；证义（译主的助手）；证文（看是否读错）；度语（口译）；笔授（记录下梵文译成汉文）；缀文（整理）；参译（校对）；刊定（去掉重复）；润文（从修辞上加以润饰）；梵呗（对照原文音调，看译文是否琅琅上口）；监护大使（最后审定）。故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继玄奘之后义净曾去印度取经求法，归国后受到武则天重视。义净（公元 635—713 年），俗姓张，字文明，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一说齐州（今山东济南）。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的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他试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一百五十赞佛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华严经》的翻译。第三阶段，在则天久视元年（700 年）以后义净自设译场，亲自翻译佛经，先后在洛阳、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他坚持直译的特点，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在语译方面，区分俗语雅语，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以求得准确的发音，因此在总体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

到了北宋时期，僧人、佛教史学家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绣，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绣），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第二时期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

17 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因此从明末清初起，我国翻译事业已经从佛教翻译转向对西方科技的译介。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到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间，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林纾（1852—1924 年）开始翻译小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所以林纾被称赞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之后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一百八十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

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二十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七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六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五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两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五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四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三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三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与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进行翻译，而且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下笔如飞文不加点，使得许多文人才子大加赞赏。胡适说“林纾译出的速度四倍于我”，康有为写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严复，林即指林纾），茅盾说“除了几个小错误，颇能表达原文”。钱钟书于 20 世纪 60 年代重新阅读了林译的小册子，说仍然勾起了童年时代的幻想。“很多都值得重读，与其读‘准确’的译文，还不如读林纾的译文，保留着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严复是清末另一位很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1854—1921 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他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以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二十五岁到英国留学，热衷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回国后，他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经济方面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律方面的《法意》（*On the Spirit of Law*）；政治方面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学方面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伦理学方面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传播广泛，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译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入中国。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 1902 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 1897 年孙宝瑄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

人”，“与本国思想发生影响的第一人”。

此外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他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第三时期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的分水岭，同时也开创了我国近代翻译史。“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的重点开始转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与别致的审美对象；翻译文学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增益；文学翻译是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翻译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启蒙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诸多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乃至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作主要有：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汉译本。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其他多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大量的东西方各国优秀作品，尤其是俄苏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迈进了一个新纪元。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发表阵地星罗棋布，读者群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翻译文体渐趋丰富，白话翻译升帐挂帅，翻译批评相当活跃，翻译质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如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刘半农、郑振铎、曹靖华、董秋斯、朱生豪等。例如鲁迅先生二十三岁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介绍翻译知识和理论。人们称其为“研究西方文学的拓荒者”。他一生共译了两百多部作品，字数达三百多万，大致与其一生创作的作品相等。正如他自己所说“左手翻译、右手写作”。鲁迅先生的译作包括以俄苏为主的14个国家的著作，如裴多菲的作品，易卜生的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这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他比喻自己是“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从别国窃得火来，照亮中国的黑夜”。鲁迅在三十年代发表了几乎涉及翻译问题各个重要方面的译论。他一贯主张用直译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在翻译理论上，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原意是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鲁迅的“硬译”受到过批评，然而翻译不仅涉及到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而

且往往涉及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要使译文与原文一样信、达、雅，实属不易。鲁迅也坦诚地说过：“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此外，茅盾也论述了“直译”与“神韵”的概念。朱自清论述了“译诗”的问题。他主张“把原文的本义介绍给读者，让读者的收益与读原文一样”，强调翻译必须“非常忠实”，追求“精确”，他还指出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的异同之处。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了“媒婆”论及“风韵译”的说法。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周作人在《〈点滴〉序》里说，这部集子所收译作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其实岂止一部《点滴》，整个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都表现出这种倾向。“易卜生热”、“泰戈尔热”、“拜伦热”与“俄罗斯文学热”均源于此。儿童文学翻译盛况空前，安徒生、格林、王尔德、小川未明等人的童话，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夏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儿童文学名著等大批地译介进来，也是因为由“人”的发现而意识到了“儿童”的独特性。总之五四时期的所选择的译作主要是因为其中表现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正为新文化启蒙运动所急需。可见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与现代启蒙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时期 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空前发展，翻译事业也跨入了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迎来了第四次高潮。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这种“入超”地位。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出现了师哲、巴金、李良民、楼适夷、高值、刘宓庆、焦菊隐、丰子恺、文洁若、成仿吾、郭大力、飞白、荣如德、杨武能、黄龙、罗新璋等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们译介了苏俄文化、日本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北美文化、英国文化以及印度等国家文化。

近二三十年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通讯设备的飞跃发展，再加上全球化的推动，大大改变了人际沟通及信息传播的面貌，成就了非文学翻译的繁荣，翻译也走向了职业化，翻译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我国对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据统计：目前中国现有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翻译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达50万人，专业翻译公司3000多家，但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缺口却高达90%，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也大约只占总数的5%。几年前，上海市对50多种职业的小时工工资指导价显示，专业类翻译人才的工资最高达到每小时2000元。专业类文字翻译身价更是比普通类翻译高一至两倍，甚至四至五倍左右。

我国翻译人才紧缺，特别是专业化翻译人才高度紧缺，改变了人们传统认为的懂外语就能搞翻译的观念，也使传统翻译理论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知道，翻译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翻译专业课程设置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目前我国翻译方向硕士生课程设置大都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是因为翻译方向硕士生的培养目标是高校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其培养模式偏重于学术性，在入学考试、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学位论文写作等方面，都是按照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的。忽视翻译操作技能的培养，就会导致翻译实践能力偏低，不利于应用型、专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把外语专业等同于翻译专业，认为凡是学外语的人都会搞翻译，忽视了翻译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实，这两个专业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着根本的差异。从教学目标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培养外语交际能力，在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技能中，“译”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手段。翻译专业教学则把翻译能力作为培养目标，从职业需求出发，培养学生在双语交际能力基础上的翻译技能。从教学内容来说，传统外语专业主要学习语音、语法、词法、句法等语言基础知识，用单一的语言（即外语）去进行听说和表达，基本上不涉及双语转换机制。翻译专业则主要学习如何借助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翻译职业技能来对原语信息进行分析理解，并用译入语将所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双语转换机制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认知学、信息论、跨文化等多种学科，教学中应适当补充相关的内容。从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说，传统外语专业教学需要一个良好的外语交际环境，以利用各种手段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翻译专业教学所需要的则是双语交际环境，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和教学资源，训练学生用一种语言来理解信息，而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相同的信息。更重要是，翻译教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强调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

我们认为，翻译的职业化不仅仅是译者职业身份的体现，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职业化译员在特定社会中为特定人群的利益服务，必然受到相关社会力量的制约，也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透明的。除了翻译的语言问题，我们还需要关注翻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翻译产品如何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促进人类的交流。职业化译员不仅仅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双语、双文化的语言专家，更要承担起文化协调人的角色，认识到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观的相对性，从而树立科学、平等的文明观，能够尊重与对方的差异。

随着翻译职业化进程的加深，翻译产业的形成，翻译研究学科体制化的建立，今天的翻译研究领域远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性的学科。翻译作为一个技术知识服务性质的产业，今天的价值在于根据已有的数据创造出新的知识，将专家信息流传达给潜在的、用于各自目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为其他行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

职业化翻译最具活力的需求无疑在商业、法律与技术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翻译和语言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把翻译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对其进行分析、管理，以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质量，缩短翻译时间。这使得翻译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性产业。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翻译市场的调查，全世界翻译市场的规模在1999年只是104亿美元，在2003年为172亿美元，而在2005年则达到了227亿美元，2009年中国翻译市场则达到了300亿元人民币。从翻译职业化的发展来看，我们还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去认识翻译职业化的含义。（1）职业化不仅仅是

一种技能训练，而且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2) 翻译教育也必须同时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因此，翻译的职业教育应该与一定的理论与学术融合起来。也就是说，翻译作为一种职业，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其专业化程度都很高，应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从业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中文基础和至少通晓一门外语，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翻译学和专门学科知识以及翻译操作技能。

翻译职业化的发展，使翻译研究者不能再埋头书斋、不问世事，仅关注占翻译生产不到 1% 的文学翻译。翻译职业化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课题，需要我们面对鲜活的翻译现实，革新我们的翻译观念，对翻译教学与研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近年来，国内翻译教学界培养专业翻译人才的理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有了新举措，如设立本科翻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TI）等，初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翻译教学体系。2006 年春，教育部批准在部分高校试点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2008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上，《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大纲》讨论稿中将翻译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毕业生能够胜任政府涉外部门、新闻传播、外经外贸、外资企业、高等学校等部门的翻译活动、文字编审和交际沟通工作，并成为翻译院系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后备人才。”

翻译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不仅是翻译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经济、科学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但任何新专业的设置，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凸显“应用”特色。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情况来看，社会急需的是高层次专门性口笔译实践人才，翻译专业毕业生尤其是商务、法律方向学生特别受欢迎，就业率非常高。从文献资料来看，国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基本上也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在课程设置、教学要求、教师资格、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以培养翻译实践能力为重点。世界上大约有 270 多所高校设有翻译教学与研究项目，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培养专门的口笔译实践人员和翻译理论研究人员，授予翻译硕士或翻译博士学位。我国港台地区翻译专业教学也办得有声有色。香港 8 所政府拨款的大学中有 7 所都设有翻译系或翻译课程，培养翻译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各校办学特色鲜明，针对性强，分别侧重传媒翻译、法律翻译、科技翻译、机辅翻译、商务翻译等方向。^①

第二节 翻译的基本原理

一、翻译的性质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它是使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交流沟通的纽带和桥梁。然而由于翻译的形式和内容相当纷繁复杂，从中抽象出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翻译的定义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重任，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此作出了许多努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

^① 本书就是为了应对翻译职业化的挑战，从全新的视角——文体的角度探讨翻译的新型教材。

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活动作出了概括和总结。

例如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说：“翻译就是接受语言（receptor language）复制出与原语（source language）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等值体——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产物的过程”；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索伯列夫指出：“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认为“虽然翻译的最终结果大概是属于语言，而后又属于文学范畴的，可是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语际性，它是自然语言所形成的各个人类岛屿之间的桥梁”；中国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的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中国翻译家张今说“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language community）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印象或艺术印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中国现代学者林汉达说：“（正确的翻译）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中国当代学者王以铸说：“好的翻译决不是把原文的一字一句硬搬过来，而主要的却是要传达原来文章的神韵。”……

二、翻译的类型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翻译是跨语言（cross-language）与跨文化（cross-culture）的交际活动。翻译也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又是一门艺术，不像其他一些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那样，某些原则和理论可以作为标准或定律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应用，它需要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因为任何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字之间的翻译都不可能是简单的机械照搬或转换。翻译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多种类型。

首先，就涉及的语言而论，翻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指在同一种语言内进行翻译，如把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把文言文文本译为白话文本，把广东话译为普通话等等；一类为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指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如把汉语文本译为英语文本，或把英语文本译为汉语文本等。

第二，就其活动方式而言，翻译可分为口译（interpretation）和笔译（translation）两类。口译一般指口头翻译，其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连续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又称即席翻译，用于会议发言，宴会致辞、商务谈判、学术研讨、参观旅游等场合，发言人讲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之后，由口译译员进行翻译；二是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通常用于大型正式会议上，要求议员利用专用设备，不间断地边听边译。笔译就是笔头翻译，就文本类型而言可以分为非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两个大类，前者包括政论体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和应用文翻译等，后者包括小说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和戏剧翻译等；就处理方法而言，翻译可以分为全译、节译、摘译和编译等。

三、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译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对于译者从事翻译，提高翻译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翻译标准一直都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然而，就翻译标准而言，目前国内外翻译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关于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西方翻译家做过不少论述，其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英国的两位学者坎贝尔和泰特勒。1789年，英国翻译家、学者乔治·坎贝尔率先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即译者必须：首先，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义；第二，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移植作者的精神和风格；第三，使译作至少具有原创作品的特性，显得自然流畅。（Venuti, 1995: 75）翌年，英国另一位翻译家亚历山大·泰特勒也提出了一个“三原则”，跟坎贝尔的“三原则”如出一辙：一、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三、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Lefevere, 1992: 128）坎贝尔和泰特勒的两个“三原则”虽有措辞上的差异，但都以“忠实”为大前提，要求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忠实地展现原作的风格，同时还要具有原创作品的通顺。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从释道安的“案本”（意为按照原文的本意），严复的“求信”，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都不离开“忠实”这个总原则。特别是严复在1898年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佛典之翻译》）郁达夫甚至说：“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人尽皆知。”（《读丁瑯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通海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以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倍。……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意；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照严复的初衷来看，“信”就是忠实于原文的本意，“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古雅。一百年来，我国翻译界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看法不一，特别是对“雅”字一直存有异议，如陈西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撰文说：不仅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要求